

# 王廷相诗歌意象理论与气学思想的交融及其意义

陈书录

明代王廷相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诗歌意象专论,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:诗歌意象的本体论、特征论与神韵说以及建构意象的方法论。将王廷相的诗歌意象理论与其“气学”思想作交叉思考、交叉研究,可以凸显其诗歌意象理论冲击程朱理学和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力度,更加显示出其历史价值与批判意义,进而认清其在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。

“前七子”之一王廷相(1474—1554)的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<sup>①</sup>,是明代文学批评有关诗歌意象的专论,同时,王廷相又是明代中期“气学”(宋明道学分三大派:理学、心学和气学)的代表人物之一。“文成直与元气会”<sup>②</sup>,王廷相十分强调文学与“元气”及气学的融会。因而,我们顺着王廷相的思路,将他以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为代表的诗歌意象理论与其“气学”思想联系在一起研究,就能更好地把握其诗歌意象理论的内涵。

## 一、诗歌意象的本体论与“气者造化之本”

将王廷相的气学思想与意象理论相互对照,可见他将意象理论已经提高到艺术哲学的高度。王廷相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指出:

夫诗贵意象透莹,不喜事实粘著,古谓水中之月,镜中之影,可以目睹,难以实求是也。《三百篇》比兴杂出,意在辞表;《离骚》引喻借论,不露本情。东国困于赋役,不曰“天之不恤”也,曰“维南有箕,不可以簸扬;维北有斗,不可以挹酒浆”,则天之不恤自见。齐俗婚礼毁坏,不曰“婚不亲迎”也,曰“俟我于著乎而,充耳以素乎而,尚之以琼华乎而”,则“婚不亲迎”可测……斯皆包蕴本根,标显色相,鸿才之妙拟,哲匠之冥造也。<sup>③</sup>

王廷相在论证诗歌“意象透莹”等特色时,十分强调以“比兴杂出”或“引喻借论”等方法所创造的诗歌意象都“包蕴本根”。他所说的“本根”,从探究客观世界本原的角度来看,是与“气本”或曰元气本体论相关联。王廷相在《慎言·道体篇》中指出:“气者造化之本,有浑浑者,有生生者,皆道之体也。”<sup>④</sup>那么,王廷相是怎样将诗歌意象与“气本”论相联系的呢?应该说,他受到了北宋气学家张载的影响。张载曾说:“凡可状,皆有也;凡有,皆象也;凡象,皆气也。”<sup>⑤</sup>又说“太虚无形,气之本体”<sup>⑥</sup>。王廷相不仅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这篇诗歌意象专论中多处强调“神气”、“养气”、“气充”等,而且他还在《慎言》中将元气、太虚、道体三者合而为一,称元气为太虚、道体:“道体不可言无,生有有无。天地未判,元气混涵,清虚无间,造化之元机也。有虚即有气,虚不离气,气不离虚,无所始、无所终之妙也。不可知其所至,故曰太极,不可以为象,故曰太虚,非曰阴阳之外有极有虚也。二气感化,群象显设,天地万物所由生也,非实体乎?是故即其象,可称曰有;及其化,可称为无,而造化之元机,实未尝泯。故曰道体不可言无,生有有无。”<sup>⑦</sup>显然,从“象”与“气”之间的关系来看,当元气“不可以为象”——或说“元气之上不可意象求”<sup>⑧</sup>——的“无形”之时称为“太虚”,这是气的本然状态;当阴阳“二气感化,群象显设”的“有形”之时,则是气的显然状态。无论是无形无象的本然状态,还是有形有象的显然状态,其造化之本都是气,这就在本体论中坚持了唯物的精神。在王廷相看来,以气为本的“象”或“群象”,既包括自然景象,也包括诗文意象。例如有一次他与门人讨论《华阳稿》(王廷相游蜀的诗文集),其门人说:“云之生于山,气机也;升于太空,其象为峰峦,为水波,为白衣,为彩锦,为人物,为花卉。其变也,云何尝以意而为之?龙之乘乎云也,自适其性尔,感而为雨,泽彼下土,不几于神乎?使曰龙之致之,虽问之龙,龙亦不知。夫子之为文,以是求之,可乎?”听了门人的这番议论,王廷相赧然而笑曰:“有是哉!”<sup>⑨</sup>由此可见,王廷相明确地将诗歌意象与“气”联系在一起,这在他的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也可以找到佐证:“不曰‘己德之修’也,曰‘余既滋兰之九畹兮,又树蕙之百亩,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蘅与芳芷’,则己德之美,不言而章。不曰‘己之守道’也,曰‘固时俗之工巧兮,偈规矩以改措,背绳墨以追曲兮,竞周容以为度’,则‘己之守道’,缘情以灼。”<sup>⑩</sup>所论诗句见于屈原的《离骚》。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中指出,屈原的《离骚》等作品中蕴含着“精气说”,其中所说的“‘内美’即‘内德’,就是指他自己所有的精气”<sup>⑪</sup>。显然,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所引《离骚》中的诗句,其“己德”、“己美”,也是指屈原所有的精气,而又化为“兰”、“蕙”等诗歌意象。应该强调的是,从探究客观世界本原的角度来看,王廷相坚持“气者造化之本”的同时,又坚持诗歌意象以“气”为本,而且他还坚持“气为理本”:“夫万物之生,气为理本,理乃气之载,所谓有元气则有动静,有天地则有化育。”<sup>⑫</sup>由此可见,王廷相以“气者造化之本”为哲学基础的诗歌意象本体论,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反对明代定于一尊的朱熹理学的意义。

王廷相十分强调以“比兴杂出”或“引喻借论”等方法所创造的诗歌意象都“包蕴本根”。他所说的“本根”,从探究主观世界的本质的角度来看,是诗歌创作主体与诗歌意象都“本乎性情之真”:“今观梅国之诗,厥才广博,岳藏海蓄,厥气逸荡,霆奔风掉,厥辞精润,金相玉质;又皆本乎性情之真,发乎伦义之正,无虚饰,无险索,无淫取,可以移风易俗,可以助流政教。所谓温柔敦厚,发乎情,止乎义礼,以形诸四方之风者,不其是在乎?”<sup>⑬</sup>王廷相在这里指出,诗人刘节的广博之才、逸荡之气、精润之辞和“霆奔风掉”的诗歌意象,都是以“性情之真”为本。同时,王廷相在为刘节《广文选》所作序中说:“大人硕儒,探元挈要,先之修性体道以敦其本,又能察于君臣之政,观夫天下之势,达乎民物之情,则文之质具矣。”<sup>⑭</sup>显然,王廷相用两篇序中的“本乎性情之真”、“先之修性体道以敦其本”等论述,将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“本情”(“引喻借

论,不露本情”)二字诠释得十分清楚,也就是说将诗歌意象中的性情本体论说明得十分清楚,同时也表明了诗歌意象中的性情本体论与逸荡之气、“探元(元气)挈要”等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他所说的诗歌创作主体与诗歌意象都“本乎性情之真”,与明中叶颇为流行的王阳明“良知”或曰“童子之情”<sup>⑤</sup>说有区别,也与深受王阳明“良知”说影响的李贽“童心”说有所不同。

## 二、诗歌意象的特征论与“生有有无”及“虚实皆气”

王廷相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概括了诗歌意象的特征:“夫诗贵意象透莹,不喜事实粘著,古谓水中月,镜中之影,可以目睹,难以实求是也……言征实则寡余味,情直致而难动物也,故示以意象,使人思而咀之,感而契之,邈哉深矣!此诗之大致也。”<sup>⑥</sup>将化“直”为曲、化实为虚、若有若无、透莹含蓄、远神余味等,视为诗歌意象的主要特征。这与他的“生有有无”等哲学观点有相通之处:“是故即其象,可称曰有;及其化,可称曰无,而造化之元机,实未尝泯。故曰:道体不可言无,生有有无。”<sup>⑦</sup>其“生有有无”中的“生”,指生气。王廷相将气分“元气”与“生气”,所谓“有形,生气也;无形,元气也”<sup>⑧</sup>。也就是说,元气是无形之物,是气的本然状态;生气是有形之物,是气的显形状态,是处于有形之物生生不息的状态。因而,王廷相说:“太虚无形,气之本体,清通而不可为象也;太和氤氲,万物化醇,生生而不容以息也,其性命之本原乎!”<sup>⑨</sup>又说:“天内外皆气,地中亦气,物虚实皆气,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。”<sup>⑩</sup>王廷相将有形与无形、虚与实等都统一于气,并强调“生气”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。这种观点用于他的诗歌理论之中,往往是化实为虚,化“事实粘著”为生气流动,化景物与性情为“透莹”的意象。

作为上述观点正面的例证,王廷相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列举了《诗经》与《离骚》中的诗句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写道:“维南有箕,不可以簸扬;维北有斗,不可以挹酒浆。”<sup>⑪</sup>不能扬糠粃的箕星、不能舀酒浆的斗星等意象,比喻那些不能体恤人们痛苦的高高在上者。《诗经·齐风·著》共三章,第一章为:“俟我于著乎而,充耳以素乎而,尚之以琼华乎而。”<sup>⑫</sup>这是一位新娘视野中冠饰高贵的迎亲夫婿的形象,蕴含有新娘的喜悦之情。但是,王廷相以《毛诗序》中“《著》,刺时也。时不亲迎也”<sup>⑬</sup>等传统说法来解读,其出发点是说这首诗化景物与性情为意象。屈原的《离骚》中有云: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,又树蕙之百亩;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蘅与芳芷。”<sup>⑭</sup>用兰、蕙、留夷、揭车、杜蘅、芳芷等一系列香草意象,比喻培育各种人才。以上例证,有的是比兴杂出的意象,有的是博喻性的系列意象,化“事实粘著”为生气流动,化景物与性情为意象,透莹含蓄、自然入妙,意在言外。这是王廷相在将“生有有无”及“虚实皆气”等哲学思想与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等诗歌创作的实际作交叉思考、交叉研究的基础上所把握的诗歌意象特征。

作为上述观点反面的例证,王廷相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列举了杜甫的《北征》、韩愈的《南山诗》、卢仝的《月蚀诗》与元稹的《阳城驿》等诗篇。杜甫《北征》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,诗中既描写了人烟萧条、伤残满目的战乱景象,又抒写了心系时局、忧国恋主的情感,还表达了对皇纲复振、国家中兴的希望,属于杜甫诗集中纪事、抒情、议论的大手笔。这首诗善于用“赋”的手法,铺陈终始,夹叙夹议,波澜壮阔,但在议论化、散文化等方面为中唐韩愈、卢仝、元稹及其后宋诗开先河。应该说,杜甫的《北征》、韩愈的《南山诗》、卢仝的《月蚀诗》与元稹的《阳城驿》,虽然在散文化、议论化方面一脉相承,但所达到的思想程度与艺术水平则高低不同。王廷相为强调诗歌“意象透莹”的需要,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一律苛责上述作品:“漫敷繁叙,填事委实,言多趁帖,情出附赘,此则诗人之变体,骚坛之旁轨也。”<sup>⑮</sup>进而极力指责那些见识不广的浅薄的追随者“志乏尚友,性寡神识,心惊目骇,遂区畛不能辩矣”<sup>⑯</sup>。诚然,这有些偏

激地对杜甫《北征》等诗求全责备,但耐人寻味的是,南宋理学家朱熹对中唐以险怪著称的卢仝等人却从“混成”的角度加以肯定:“诗须是平易不费力,句法混成。如唐人玉川子辈句语虽险怪,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。”<sup>②</sup>显然,作为气学家的王廷相与朱熹理学有分歧,其中也表现在对诗歌气象(意象)的看法上,王廷相一反朱熹的看法,一针见血地指出卢仝及其追随者诗歌创作的弊端:“言征实则寡余味也,情直致而难动物也。”<sup>③</sup>我们可以从这反对声中看到王廷相正面的观点,这就是强调诗歌意象的以情动人、味外之味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效果,进而将具有以情动人、味外之味等艺术特征的诗歌意象提升到作为诗性生命的本体的高度:“故示以意象,使人思而咀之,感而契之,邈哉深矣!此诗之大致也。”<sup>④</sup>如此将诗歌意象提升到作为诗性生命的本体高度,强调诗歌创作中应该遵循“示以意象”等艺术规律,这在有明一代乃至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是难能可贵的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王廷相与“生有有无”、“虚实皆气”等哲学思想相沟通的意象论也引出了神韵说:“气韵清绝,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,滋味冲澹,精神独爽。”<sup>⑤</sup>清绝的气韵、冲澹的滋味与独爽的精神,与“意象透莹”等特色相辅相成,也就是说王廷相的神韵说与意象论相辅相成。显然,王廷相与他谪居亳州判官期间的得意门生薛蕙(号西原)堪称清代神韵诗论的先驱者之一。清代王士禛在《池北偶谈》中说:“薛西原论诗,独取谢康乐、王摩诘、孟浩然、韦应物,言:‘白云抱幽石,绿筱媚清涟。清也。表灵物莫赏,蕴真谁为传。远也。何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;景晨鸣禽集,水木湛清华。清远兼之也。总其妙在神韵矣。’神韵二字,予向论诗,首为学人拈出,不知先见于此。”<sup>⑥</sup>应该说,王廷相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这篇意象专论中引出神韵说,也可谓有先见之明。

### 三、建构诗歌意象的方法论与“会于人事”及“会通冥契”

关于建构诗歌意象的方法,王廷相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提出“三会”、“四务”之说。“何谓‘三会’?博学以养才,广著以养气,经事以养道也。”“博学”是扩充建构诗歌意象者的学识之“流”,“经事”是开拓建构诗歌意象者的生活之“源”,而“广著以养气”是在二者基础上向“元气”本体上提升、融合。这与他“会于人事”及“会通冥契”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,也是对诗歌意象的创作主体素养的基本要求。

与王廷相建构诗歌意象方法论密切相关的是他“会于人事”说:“夫心固虚灵,而应者必藉视听聪明,会于人事,而后灵能长焉。”<sup>⑦</sup>王廷相是明清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,十分强调“惟实学可以经世”<sup>⑧</sup>。他针砭程朱理学、陆王心学弊端的同时,大力提倡诗歌意象的创作主体“会于人事”或曰“于实践处用功,人事上体验”。“近世学者之弊有二:一则徒为泛然讲说,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,皆不于实践处用功,人事上体验。”<sup>⑨</sup>其中“徒讲说”者是指程朱学派,“务守心”者是指陆王学派。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认识上虽有不同之处,但这两派在实质上都是“不于实践处用功,人事上体验”,在一定的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实际。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不同的是,气学家又是实学家的王廷相非常重视在实践中致知,在人事酬应上锻炼。他将这种精神移之于诗歌意象的创造上,那就是他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强调“经事以养道”,开拓建构诗歌意象者的生活之源。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他的具体的文学批评上。例如《诗经·小雅·小宛》中写道:“螟蛉有子,蜾蠃负之。”<sup>⑩</sup>南宋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注解:“蜾蠃,土蜂也,似蜂而小腰,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,七日而化为其子。”并说:“螟蛉有子,则蜾蠃负之,以兴不似者可教而似也。”<sup>⑪</sup>但是,王廷相经过多年“取土蜂之窠验之”,证明这是一种“踵讹立论”的“无稽之言”<sup>⑫</sup>。



显然,他对“螟蛉有子,蜾蠃负之”等意象的创造与意象的批评,往往从实践中致知,有时与“徒讲说”的程朱学派的见解大相径庭。应该说,王廷相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以最明确的语言将“实践”及“会于人事”等重要观点导入建构诗歌意象的方法论。

与王廷相建构诗歌意象方法论密切相关的是他“会通冥契”说:“广识未必皆当,而思之自得者真;泛讲未必吻合,而习之纯熟者妙。是故君子之学,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,讨诸理而尤贵达于事。心理贵涵蓄,久之可以会通冥契。”<sup>③</sup>他强调知行兼顾,将“博于外”与“精于内”紧密地结合起来,进而在“会通冥契”中将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。与这种“会通冥契”相关联的仍是王廷相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的“三会”、“四务”之说。“三会”主要指诗歌意象开拓的方法,“四务”则主要指建构诗歌意象中审美调节的方法,后者被王廷相称之为“艺匠之节度”。“何谓‘四务’?运意、定格、结篇、炼句也。意者诗之神气,贵圆融而忌暗滞。格者诗之志向,贵高古而忌芜乱。篇者诗之体质,贵贯通而忌支离。句者诗之肢骸,贵委曲而忌直率。”<sup>④</sup>用圆融、高古、贯通、委曲来调节意、格、篇、句,为建构古雅型诗歌意象找到了一种颇为有效的方法。

作为王廷相建构诗歌意象方法论哲学基础的“会于人事”及“会通冥契”说,与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说截然不同,王廷相指出:“有为虚静以养心者,终日端坐,块然枯守其形而立,曰‘学之宁静致远在此矣’……斯人也,空寂寡实,门径偏颇,非禅定则支离,畔于仲尼之轨远矣。何以故?清心志,祛烦扰,学之造端固不可无者,然必有事焉而后可……夫心固虚灵,而应者必藉视听聪明,会于人事,而后灵能长焉。赤子生而幽闭之,不接习于人间,壮而出之,不辨牛马矣,而况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之节度乎?而况万事万物,几微变化,不可以常理执乎?彼徒虚静其心者,何以异此?”<sup>⑤</sup>充分揭示了包含禅定等在内的“致良知”说脱离视听、脱离人事、“空寂寡实”的修养路径。由此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,王阳明所说的“良知”或曰“童子之情”是先验的精神实体,带有主观唯心的倾向,而深受王阳明“良知”说影响的晚明李贽的“童心”说,虽然在当时有某种思想解放(启蒙)的意义,但其主要缺陷也是脱离人事、“空寂寡实”。

作为王廷相建构诗歌意象方法论哲学基础的“会于人事”及“会通冥契”说,也有针砭复古模拟诗风的意义。对此,王廷相在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中强调,只有“会于人事”及“会通冥契”,作者才能“久焉纯熟,自尔悟入,神情昭于肺腑,灵境彻于视听,开阖起伏,出入变化,古师妙拟,悉归我闼。由是搦翰以抽思,则远古即今,高天下地,凡具形象之属,生动之物,靡不综摄,为我材品,敷辞以命意,则凡九代之英,《三百》之章,及夫仙圣之灵,山川之精,靡不会协,为我神助。此非取自外者也,习而化于我者也。故能摆脱形模,凌虚构结,春育天成,不犯旧迹矣。乃若诸家所谓雄浑、冲澹、典雅、沉著、绮丽、含蓄、飘逸、清俊、高古、旷逸等类,则由夫资性学力,好尚致然,所谓万流宗海,异调同工者也。”<sup>⑥</sup>从熟精范本到自省自悟,从章法开阖起伏到敷辞命意,从熔铸古今到凌虚构结乃至风格的多样性,都显示了诗歌意象的创造者“会通冥契”的能力对于“摆脱形模”(摆脱复古模拟之风)的重要性。又如,王廷相在为黄绾《石龙集》所写的《序》中指出:“夫今之人,刻意模古,修辞非不美也,文华而义劣,言繁而蔑实,道德政事,寡所涉载,将于世奚益?”<sup>⑦</sup>作为明中叶原先力倡复古的“前七子”一员的王廷相,在自省自悟中从“会于人事”、求实益世的角度抨击复古模拟之风,更具有针砭时弊、转换诗风的现实意义。

应该说,在明中叶的“前七子”中对在格调表层上复古模拟有所自省并倡导诗歌意象论者,不仅有王廷相,还有何景明等。何景明在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中从离合的角度论意象:“夫意象应曰合,意象乖曰离。”<sup>⑧</sup>并以佛家舍筏比喻诗歌意象建构的方法:“佛有筏喻,言舍筏则达岸矣,达岸则舍筏矣。”<sup>⑨</sup>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脱离人事、“空寂寡实”。再向前追溯,晚唐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·缜密》(对其著作权有不同的看法,此不论)中论意象的生成:“是有真迹,如不

可知。意象欲生,造化已奇”<sup>④5</sup>。南宋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中说:“所谓不涉理路,不落言筌者,上也。诗者,吟咏情性也。盛唐诸人惟在兴趣,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,不可凑泊,如空中之音,相中之色,水中之月,镜中之象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<sup>④6</sup>这都受到庄子与禅学的影响,其主要缺陷也是脱离人事、“空寂寡实”。由此可见,王廷相的意象论特别是建构意象的方法论,是建立在“会于人事”及“会通冥契”等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艺术方法论。

总之,王廷相有关诗歌意象的本体论、特征论、方法论,是他从气学思想向诗学思想转化的结果。其思想对于明代定于一尊的程朱理学,对于明中叶颇为流行的阳明心学,对于明代以李梦阳等为代表的“前七子”在格调层面上的复古模拟之风,都有一定的冲击力,颇有批判精神与历史意义。与王廷相诗歌意象理论密切相关的是近代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(其主要批评对象是词,兼及诗歌与小说、戏曲)中的“境界”说,而“境界”一词较早见于佛经,王国维的“境界”说又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。而早于王国维近四百年的王廷相论述诗歌意象的思路,注重将诗歌意象与气学思想交融在一起,其影响不可低估。研究王廷相的文学理论,对于我们进一步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意象理论的建设,颇有借鉴作用。

①③⑩⑬⑤⑥⑧⑨⑪⑫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王廷相: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,《王廷相集》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502—504页,第502页,第502页,第502—503页,第503页,第503页,第503页,第503页,第502页,第503页,第503—504页。

② 王廷相:《少谷子歌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178页。

④⑦⑪⑱⑳ 王廷相:《慎言·道体篇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755页,第751页,第751页,第758页,第753页。

⑤ 张载:《正蒙》第十七《乾称篇》,《张载集》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63页。

⑥ 张载:《正蒙》第一《太和篇》,《张载集》,第7页。

⑧⑫ 王廷相:《太极辩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597页,第597页。

⑨ 王廷相:《华阳稿序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414页。

⑪ 冯友兰: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,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,上册第422页。

⑬ 王廷相:《刘梅国诗集序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417页。

⑭ 王廷相:《广文选序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419页。

⑮ 王阳明:《训蒙大意为教读刘伯颂等》,《王阳明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第87页。

⑰ 王廷相:《慎言·乾运篇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751页。

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,第462页,第349页,第349页,第451页。

㉔ 洪兴祖:《楚辞补注》卷一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10页。

㉖ 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卷一四〇,中华书局1999年版,第3328页。

㉙ 王士禛:《池北偶谈》卷一八,中华书局1997年版,第430页。

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王廷相:《石龙书院学辩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604页,第604页。

㉛ 王廷相:《送泾野吕先生尚宝考绩序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419页。

㉜ 王廷相:《与薛君采二首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478页。

㉝ 朱熹:《诗集传》卷一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第139页。

㉞ 王廷相:《雅述》下篇,《王廷相集》,第880页。

㉟ 王廷相:《慎言·潜心篇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776页。

㊱ 王廷相:《石龙集序》,《王廷相集》,第418页。

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,《大复集》卷三二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5 郭绍虞:《诗品集解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26页。

④6 郭绍虞:《沧浪诗话校释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,第26页。

(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)

责任编辑 山木